

总第五十九辑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主编 金明善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 研究新格局下的政治经济学 / 俞炜华

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家庭规模越来越小，那么国家规模呢？

上个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从规模经济与异质偏好成本权衡的角度分析国家均衡规模及其变动。在该分析框架外生化异质偏好成本和忽视管理成本在权衡中作用的假设下，大多得出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国家规模会越来越小的结论。这是否吻合世界发展大势呢？

当我们将视角转向 2000 多年前的中国，在春秋战国的封建列国制度下，包括儒家、法家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并没有被列国间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表象所迷惑。他们发现组织国家管理成本的急剧下降，不约而同地提出天下将“定于一”的结论。

因经济分析一般集中于短期，因此在对企业、家庭规模的分析中，偏好不变假设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当我们把分析视角转向长期存在的国家时，数不胜数的例子表明，时间是降低异质偏好成本的利器。如吴越间的灭国之恨，秦赵间坑杀 40 万降兵之仇，在 100 年不到的时间内消磨殆尽，曾经敌对的双方融合成统一的汉民族。

在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以来，底层和高层间的信息交流已经不需要依赖于信息扭曲和失真的多层科层制度，最优科层次数下降，由此产生了组织国家成本的急剧下降。该变化比春秋战国的郡县制和科层制创新更大，影响也将更为深远。如利用信息技术，美国政府在没通知巴基斯坦的情况下，由总统直接指挥对拉登的精确打击……由此可见，在信息技术的协助下，美国霸权的实现已经不需要依赖于扶植他国的代理政权，已经进入直接控制的阶段。

在经济自由化及由此带来的协调规模经济和组织国家成本急剧下降的现实世界中，国家规模的实际变动趋势为扩大而不是现有经济理论所认为的缩小。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种趋势？国富并不意味着国强，经济学者应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国际重大战略格局的研究，为 2000 年后的中华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五十九辑

##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松奇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 方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荆林波 顾海良

梁小民 黄少安

程恩富 蔡继明

## 主编

金明善

## 特邀执行主编

詹小洪

## 项目负责人

董新兴

## 特约编辑

朱庆民 李淑娟

## 特邀执行主编助理

雒亚龙

## 卷首语

俞炜华 研究新格局下的政治经济学 / 001

## 学界万象

陈 宪 文学获奖了, 经济学还远吗? / 004

周业安 经济学家的工程师梦想 / 008

周 勤 “斯隆”模式是这样炼成的 / 014

包 特 我在博士期间开会的经历和体验 / 020

## 国是我见

姚 洋 不平等和中等收入陷阱 / 023

荆林波 关注分好蛋糕 / 028

恽 薇 改革未竟全功, 国企尚需努力 / 032

赵红军 “不该市场化的”市场化可怕在哪里? / 036

## 学问聊斋

邱 东 套用经济学模型的可能陷阱 / 041  
——读凯根《三种文化》札记

松 木 学术研究中的“经济原则” / 048

梁平汉 文艺创作与经济学建模 / 053

欧阳峤 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 / 057

李晓平 “凯恩斯理论”错在哪里? / 063

## 生活中的经济学

王 军 经济学家眼里的美容 / 069

赵世勇 冯迪刚 好心何以办坏事? / 074

李增刚 习俗是被解释的还是被执行的? / 080

陈惠雄 老年卡的幸福之路与社会保障的绿色之谜 / 083

郭金喜 居民小区楼道灯为何难以亮起来 / 088

蔡银寅 美酒中国: 交易文化的缩影 / 091

## 经济随笔

朱 玲 西陵镇今昔 / 097

宋胜洲 假日如何经济? / 102

## 经济评论

- 蔡晓峰 理财产品与庞氏骗局 / 106  
 顾海兵 公民的权利与公仆的权力 / 111  
 蒲勇健 烂尾工程：圈地及非正规获取项目中的博弈策略 / 115  
 朱富强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 120

## 经济史话

- 刁仁德 乾隆皇帝与英国人的摩擦 / 125

## 财经阅读

- 黄有光 人类婚姻有前途吗?  
 ——评俞炜华的《婚恋与选择》 / 129  
 卢昌崇 话说“爷们儿”：士宦工商的气节  
 ——《中国非二》序 / 133  
 李俊慧 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  
 王 勇 以“常无”心态研究“新结构经济学”  
 ——再读林毅夫教授《本体与常无》

## 经济学人

- 董 昀 凯恩斯与熊彼特：谁执经济学界牛耳? / 150  
 皮建才 奥斯特罗姆与问题导向的经济学 / 155

## 他山之石

- 徐康宁 非洲为什么始终贫穷 /  
 颜 军 临时工：美国军工企业的难题 / 163  
 王永钦 没有泡沫的经济增长：  
 日本的教训与德国的经验 / 167  
 吴崇伯 印尼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 / 169  
 詹小洪 东北亚经济棋局中的韩国 / 17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59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978-7-209-06971-7  
 I.①经… II.①金… III.①经济学-文集 IV.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第319902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编: 250001

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 (0531) 82098012

mail:chazuo4901@126.com

发行部电话: (0531) 82098027  
 82098028

邮购电话: (0531) 8209802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11印张 160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 18.00元





# 文学获奖了，经济学还远吗？ / 陈 宪

瑞典文学院于2012年10月11日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这意味着，第一位中国籍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中国籍的人士获得了诺贝尔学科奖（除和平奖），其意义之重大和深远，不言而喻。由于文化的阻隔，语言的障碍，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学奖的难度本来似乎要大于经济学奖。但是，文学先于经济学了。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离中国人还有多远呢？

本文标题的句式仿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可能会给读者一个印象：笔者的意思是，中国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不远了。其实不然。笔者并不那么乐观。这里，远，抑或不远，当然取决于中国经济学人的集体努力——方向正确的努力，方法正确的努力。然而，就像成功需要勤奋，还需要机遇一样，中国经济学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需要因缘际会。

## 正确认识诺贝尔奖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诺贝尔奖。无疑，诺奖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奖，对于推动科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然而，诺贝尔奖只颁发给若干个学科，有些重要的学科，如数学，并不在其颁奖的范围内。而且，诺奖只颁发给有基础理论贡献的研究，那些重要的应用性学科，如计算机科学，就没有设置诺贝尔奖。

具体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专家介绍，它的终极目标是获奖者对学术圈自身的影响，而90%的情形是这种影响来自方法论的突破，10%是思想的进步。不过，这个目标的表述和百分比失之绝对，而且，方法论和思想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尽管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时间序列统计理论、动态宏观经济学等方法论领域，但是，他们的实证研究成果在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双向影响方面，也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尤其对我们在经历了一系列经济、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后，认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关系方面，有着思想启迪的价值。

当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偏爱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贡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认为，萨金特和西姆斯荣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但近乎垄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界，也给不出挽救金融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的良方。对于这个尴尬的现象，有学者认为，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最本质意义上说，人类经济活动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因为人性本身变幻莫测。美国经济学界搞了那么多复杂至极的经济计量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今天全球经济的困境。萨金特和西姆斯就是宏观计量模型领域的领军人物。第二，美国主流经济学界过度重视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却忽视人类经济体系演化最重要的基本力量，如人的行为不可逆、风险（泡沫）递增、制度僵化等等。这也许说明，好的方法论只有用于研究有价值的人类问题，并验证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假说或猜想的形式）时，才到达了人们期待的境界。

不过，笔者还以为，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还是一旦进入深刻的衰退或萧条时期，最终推动或拯救经济的力量都来自于经济之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更加本源意义的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其背后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联盟。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在事后给出一些解释。

## 中国经济学家何以至今未获诺奖？

每年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经济学家何以至今未获诺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至少有华裔获得过，但经济学奖，迄今甚至连华裔都没有获得过。人们当然有更多的理由发问。

有不少中国的经济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主要是：

其一，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或者是更多的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二，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人们还提出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显然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亦即中国文人的通病，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这些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获奖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

### 国际化是绕不过去的

经济学的国际化，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必经之路。这是因为，经济学并不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业化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际化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质疑的过程，乃至为我所用的过程。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无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是现代经济学（金融学）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些不是我们拒绝经济学国际化的理由。一方面，在这些挑战背后，孕育着经济学产生新的革命的契机；另一方面，我们唯有置身于国际化，才能进入接受挑战的行列，对经济学的现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否则，我们将继续被边缘化、非主流化。

经济学的国际化，首先是人才队伍的国际化。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的师资将主要来自海外院校；中国的著名高校的师资，主要是来自海外名校。当然，在非海外学位的师资中，有一部分经过海外访学、合作研究和自身努力，完全可能成为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师资。这样的事例已大量存在。因此，人才队伍国际化的途径是多元的。其次是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必须承认，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有着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着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国际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引进、学习和消化这些共性，以使我们能够培养出可资进行国际比较和国际对话的经济学人才。再次是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我们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由于话语权、标准（如各种期刊索引）制定等复杂的原因，研究成果国际化出现了各种偏颇，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研究成果国际化的理由。在研究成果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现有的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评估制度，以激励中国的经济学人做出更多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且能够提出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

一所大学，一个院系，其国际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学科带头人

的视野和观念的国际化，即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化观念决定着人才队伍、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 做扎根于中国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学人以什么成果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大的可能是以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问鼎诺贝尔奖，即那个 10% 的，属于“思想的进步”的成果。因此，以标准的方法和方论，做扎根于中国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人集体的努力方向。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本合作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前言中写道：“当下主流经济学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是以欧美国家，准确地说，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sup>〔1〕</sup>的经验事实为实证基础的。它们基本的经验事实是，市场是自然发育成熟的，政府是在市场机制出现失灵时进入经济生活的。中国则不然，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政府的作用息息相关，市场的最大失灵，就是其发育不足。而且，中国有着那些国家所没有的发展特征——地区间、城乡间和产业间不均衡，以及人口众多。因此，中国是以其独特背景——二元结构、体制转轨，并以其独特方式——渐进式改革和非均衡发展，走向市场经济的。存在于这个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事实，对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现代经济学来说，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事实作为其实证基础的一部分，是一项艰巨的重要工作。我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深感做这一工作的能力还不够，但试图做一些尝试。”

我当时以这段话说明，我们在编写这本教科书时，如何尽力做一些扎根中国的工作。尽管当时很皮毛，如加一些中国的案例。现在我仍然想用这段话说明，今天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做更多的高水平的扎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可以期待这些成果中会有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力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近代常被泛指英吉利人、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在的国家，即今天的大部分欧美国家形成的市场经济模式，被称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 经济学家的工程师梦想 / 周业安

国内的经济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知晓艾文·罗斯 (Alvin E. Roth) 的估计不多, 这有点让人感到困惑。从国内的学术生态推测, 罗斯完全具备了火的条件: 一来出生名校; 二来学术界颇有名望; 三来活跃于实际部门, 入世很深、很广。这种人不火, 难以置信。但偏偏罗斯在国内遇冷。笔者在 2007 年的时候, 出于推广实验经济学的需要, 把罗斯的著作《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引进国内, 由我的学生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算是国内第一次对罗斯学术成果的系统介绍。但据我所知, 这本著作的发行量挺少。罗斯在国内不火的原因何在? 思来想去, 大概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即便是罗斯在实际部门的工作, 也是有较高门槛和技术含量的, 这不符合国内一些时尚的入世学者重观点、轻方法和证据的习惯。说到底, 罗斯的东西无法让人随手拈来、夸夸其谈、迷倒众生, 于是也就不可能入时尚学者的法眼。

所幸罗斯拿了今年的诺奖, 总算让人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物。不过笔者估计, 又会有一些人开始感慨: 罗斯是谁?

他怎么有资格获奖? 的确, 罗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济学家。从公开资料上看, 他 1951 年出生于美国, 1971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获得运筹学学士学位, 随后 3 年内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运筹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足以显示其异于常人的智商。他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匹兹堡大学任教, 1998 年受聘于哈佛大学, 据说即将回斯坦福大学任教。当然, 从罗斯的简历中可能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但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会敏锐地捕捉到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罗斯的所学专业领域是运筹学, 这在国内被归入管理工程范畴, 主要考虑如何通过各种数学模型把看似杂乱的东西归置得有序; 二是罗斯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多年, 而该大学的经济学科优势之一恰恰在实验经济学。这意味着什么? 笔者在这篇小文章中不打算评价罗斯本人, 而只是想和读者分享他的一些杰作, 这些杰作可能就是您平时遭遇的。通过这些杰作的解读, 您也许能够看到罗斯的运筹学和实验经济学背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让我们分别通过四个故事来领略罗

斯的智慧吧。

## 故事一：非诚勿扰

江苏卫视有一档标志性的节目“非诚勿扰”，相信读者当中很多人都看过，笔者也经常看。每期台上站着24位女嘉宾，面试一个男嘉宾。女嘉宾如果对男嘉宾满意，就留着灯，如果不满意，就灭灯。这是0和1的选择。男嘉宾大概会有一个优序的选择，心动女生属于他第一眼的最佳选择。然后随着交流的深入，这个顺序可能发生变化。节目很欢乐，也经常有配对成功的。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不禁要问：这是一个最佳机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男嘉宾是一个序数偏好，可以对24个女嘉宾建立其一个偏好顺序，但女嘉宾只有0、1偏好，无法对每一期五个男嘉宾建立一个完整的偏好顺序，于是大多数女嘉宾可能选择等待。这就可能出现一个大概率的结果：第一个男嘉宾可能最适合其中某个女嘉宾，但该女嘉宾选择等待，从而错过了这个最佳选择。于是我们说，资源错配了。可能你会说，女嘉宾难道不会做出理智选择？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何况在短时间内评价一个人非常困难，这就使得等待策略成为最佳策略，从而造成《非诚勿扰》节目不可能带来高资源

配置效率。也就是说，该节目从电视节目的视角是非常优秀的，但从婚配视角则并不优秀。

假如我们要改进这个节目的婚配效率，该如何做？当然是让五个男嘉宾同时上场，各自表达，这样24个女嘉宾才可以针对这5个男嘉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偏好顺序，那么两个最偏好的人才可能走在一起。而这恰恰是现在一些婚恋网站和婚介所采取的现场集体相亲的做法。这个做法比电视节目的做法有效率，但缺乏娱乐，因此，婚配效率改进了，电视节目的娱乐效果下降了。

## 故事二：医生择业

医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业，对于医院来说，无法通过宽泛的社会招聘来获得高素质的员工，而对于医学院学生来说，也很难通过普通的招聘会或者劳务市场来获得心仪的职位。由于医师岗位强调执行力，因而都需要医学院学生有相应的临床实习经验，对于学生来说，也可以通过就业之前的实习来熟悉医院的各部门以及本专业的具体情况，从而可以为今后的就业做出抉择。于是实习就逐步演变成了医学院学生择业的关键环节。在我们国家，医学院学生必须有临床经历才能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通常医学院都开设有附属医院，供学生实习。学生毕业后，可以去各大医院求职。由



于学生大多都是在自己学校的附属医院实习的，其他医院对这些学生并不熟悉，这就导致了医生就业市场的错配。对医院来说，学生就读的大学的名气、专业、学历、性别等都会成为选择时考虑到的重要因素。条件好的大医院都集中在大中城市，相应的，条件好的学生以及有关系的学生就能够在这些医院获得职位，而条件一般的或者没有关系的学生可能就得不得不去普通的医院。问题在于，这种就业双向选择受太多能力之外的因素的干扰，使得就业市场的效率未必高。何况过去很多医学院学生还有定向一说，就更扭曲了医生这一就业市场。

假如完全是市场化，又如何呢？早期美国医师市场采取了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学生向各大医院申请实习，而医院根据自己对申请人的评判来选择实习生。这看似有效，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学生可能不管自己是否适合某个医院，只要这个医院有名气，就会争先恐后地去竞争实习岗位，由于这些学生并没有对医院形成一个偏好序，就导致其选择时无法按照自己的最偏好的那个来做；相应的，对有名望的医院来说，会收到过多的求职简历，而一般的医院则难以获得这么多求职者。结果就出现了大医院撑得很、一般医院则处于人才饥渴状态，同样导致了医师职位错配。何况由于美国的医学院一般是需

要经过普通大学教育之后才能就读的，学生年纪都偏大，存在许多学生夫妻的问题，这就可能造成这些学生夫妻的两地分居，同样影响医师的工作效率。

### 故事三：择校

我国为了促进教育的公平性，在城市中实行小学和初中就近上学的原则。这有点像随机配对，你如果很不幸出生在一个教育质量比较差的学校附近，那就意味着你只能就近上一所差的学校。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难解决，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投入以及合理引导来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缩短一个城市中各个中小学之间的差距。这样就近上学原则就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做法。但这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除非每个中小学完全是同质化的，否则只要学校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就可能产生错配。打个比方，假如一些学校重视体育，另一些重视文艺，还有一些重视科学研究训练。这些学校其他方面类似，但通过发展有特色的项目来吸引学生，学生如何选择？这个时候就近原则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因为很可能一个喜欢体育的学生出生在一所重视文艺的学校附近，就近上学就让他（或她）失去了发展自己兴趣的机会，而对那些具有体育特长的学校来说，也失去了一个有特长的学生的机会。



这个择校问题在申请出国留学的时候也存在。和前面的医学院学生申请实习岗位的情况类似，申请出国留学的人会集中在一些知名大学，而这些大学未必是其最匹配的大学。由于学生没有对所申请的大学进行排序，而大学也没有看到有关排序的信息，因而各自很难挑选最适合的对方。这就是很多人出国念书之后才后悔的缘由。

#### 故事四：器官移植

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能够通过器官移植来治愈一些顽疾，但器官移植存在一个关键的技术难题，那就是排异性。一个器官移植到某个人身上，必须各方面都比较符合，才能够和该人的身体合成一个自然整体，从而顺利地在该身体内工作。因此，在器官移植当中，手术本身已经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就是寻找契合的器官。通常来说，病人家属为了挽救自己的亲人，会有激励捐赠器官。但病人家属的器官未必和病人契合，这就导致了器官移植中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往往愿意捐赠器官的家属在那里干着急，而等待移植的病人苦苦等候，却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这就导致了器官移植市场上的错配。

网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结果。通过互联网搜索和信息共享，医

院和病人可以在网络上寻找合适的器官源。但有时候这会造成不公平。假如甲和乙都需要移植肾脏，两者的亲属愿意捐赠，但甲的亲属的肾脏和甲不匹配，乙的亲属的肾脏和乙也不匹配；医院发现乙的亲属的肾脏和甲是匹配的，请求乙的亲属提供肾脏给甲。假如此时甲的亲属的肾脏和乙也是匹配的，那么结果就很完美。倘若甲的亲属的肾脏和乙不匹配，那么甲得救了，而乙因此没有得救，对乙的亲属和乙本人就不公平。此时乙的亲属就可能没有激励提供肾脏给甲。器官移植市场因而出现错配。

上述四个故事都讲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社会生活中的成员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偏好序信息，并且社会中也缺乏针对这些偏好信息的配对机制，因而出现了诸多错配现象。这可以说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如何才能拯救这样一些市场？显然，通过计划管理或者国有化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我国的医院绝大多数是国有的，医学院也是国有的，定向分配带有某种计划色彩，但仍然无法解决医师的错配现象。如果完全市场化能否解决问题？前面讲的美国早期医师市场给出了很好的证明，完全的市场化也无法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回到罗斯。罗斯给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从整体上人们无法把社会像



一台机器一样精确设计出来，但在一些局部，还是可以引入工程师的做法，设计出某种合适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这就是罗斯等人提出的市场设计的理念。罗斯的灵感来自夏普利和戴维·盖尔 1962 年在《美国数学月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高校招生和婚姻的稳定性的稳定性》。在该论文当中，夏普利和盖尔发现，学校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并不是根据其偏好，而是按照某种优先顺序，即不管该学生是否真的偏好自己的学校，只要他（或她）来申请了，通过一定的评估觉得合适，就发放录取通知。但这样一来就必然会造成错配。比如条件好的学生会拿到多个录取通知，最后只会选择一个学校；而很多大学发放了多个录取通知，最后可能录不满。针对美国高校招生以及婚姻等方面的错配现象，罗斯提出了一种解决机制：递延接受程序（the deferred acceptance procedure）。这种程序的运行原理是这样的：假如某一期非诚勿扰上来了甲乙丙丁戊共五个男嘉宾，五个男嘉宾和台上 24 位女嘉宾交流后，写下一个偏好序，比如甲的偏好序是 1、5、12、7、9；而乙的偏好序是 5、6、20、23、11。同样台上 24 位女嘉宾也对五个男嘉宾进行排序。电脑进行配对，让最偏好的两个人配对成功。假设正好 1 号女嘉宾最偏好的是甲，那么两人配对成

功，从电脑里删除。然后再重复进行剩下四个，依次类推。最后每个男嘉宾都可能配对成功。

当然，实际问题远比这个要复杂。笔者只是在这里做了个极端简化的描述。当年罗斯正是基于夏普利和盖尔的思想，把其改进后运用到美国医师市场设计、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新英格兰肾脏交换计划、法律工作者市场等，并且在这些地方都取得了成功。例如，1999 年，他和皮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美国医师匹配市场的重新设计》，其中建议在原先的美国国家住院医师选拔计划（National Resident Match Program, NRMP）基础上，建立一个集中的医师登记结算中心（清算屋），医学院学生向该中心提出实习申请，但必须标明偏好序，该清算屋根据学生的申请信息，和各医院提供的招聘信息进行配对，医疗机构按照递延接受程序进行选择，首先选择最偏好自己医院的实习医师，并剔除之，直到选满为止；假如没有选满，就依次选有第二偏好的学生。如此类推，直到供求匹配位置。可以看出，这个清算屋实际上起到了医师市场的匹配功能，它既是一个信息中心，也是一个匹配中心，有点类似证券交易平台。类似的机制还可以应用于器官移植。罗斯等人研究了肾脏捐赠的案例，并设计出了

一种称之为“首位交易循环链”的机制（Top Trading Cycles and Chains (TTCC) mechanism），该机制同样要求建立一个肾脏捐赠登记结算中心，该结算中心获取病人和捐赠者的信息，并进行排序配对，由于是循环配对，每个患者都有机会获得和自己匹配的肾脏，这就使得肾脏移植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实际上，市场设计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成功的例子非常多，只不过我们都还没有注意，更别说加以深入研究了。对经济学家来说，让社会大众广为了解的有效机制大概就是拍卖，比如牌照拍卖、排污权拍卖、政府采购招投标等等，都是市场设计成功的范例。只不过我们很

少注意到，除了拍卖，还有一个匹配机制也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想想看，假如中国的经济学家愿意花点时间在正经事上，多思考一下我国各种领域当中市场的改进可能性，是不是真正对社会有所贡献呢？我们有各种劳务中介所，有社会保障部门，有国有医疗系统，有公立学校系统，但我们就是缺乏一种公开的登记结算中心，不仅导致了这些市场的错配，还引发了许多寻租现象。而经济学家多去做点工程师的工作，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局面。让我们学学罗斯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斯隆”模式是这样炼成的 / 周 勤

本文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中商学院模式的发展规律，发现以威斯康星范式为蓝本的美国模式造就了“大”商学院模式，形成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为基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商学院模式，重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著称的麻省理工的斯隆模式商学院的特征，认为“大”商学院与“小”经济学系融合模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必然和未来趋势。

### “大”商学院的来源

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是以 1776 年亚当·斯密（A. Smith）发表《国富论》为标志，但是直到 1890 年马歇尔（A. Marshall）《经济学原理》出版新古典经济学才基本形成。但是，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以 1903 年剑桥大学成立经济学系为标志，马歇尔即为第一任系主任和首位经济学教授。在此之前经济学教授们大都是教授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教授或者神学教授，在 20 世纪前英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具有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与此同时，在德留学回到美国的奈特（F. Knight）和克拉克（J. B. Clerk）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经济学系，开始建立美国学派（The School of American）。尽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始建于 1881 年，开始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学院，即使今天依然沿用沃顿学院的旧名；同样，1900 年纽约大学（NYU）的斯特恩商学院（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在创立之初是为会计和金融实务培养人才。但是，1908 年哈佛大学成立了符合现代“大”商学院、以 MBA 为起点的哈佛商学院模式，基本上被认为是现代大学“大”商学院模式的经典，现在全世界的著名商学院基本沿用这个模式。到了二战以后欧洲大学才相继成立商学院，亚洲最早的现代商学院是 1951 年成立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从学科关系而论，通常认为，经济学是管理学的一般，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而哲学是经济学的一般，所以经济学大家的哲学造诣也是非同小可的；

但是哲学家最终都会在“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的归属，也就是哲学家在最终无法解决的终极问题上会在宗教上得到解脱。虽然上述论述有失偏颇，但是，它基本表征了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在象牙塔中讨论近似哲学问题的经济学问题？而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断开始从经济理论出发，开始全方位深入研究企业问题？

严格地说，真正触发“大”商学院模式的高速发展，应该是 1929 年的大危机。按照凯恩斯理论的分析，大危机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引发。但是，他没有解释危机形成的微观基础，就是产业革命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以“泰罗制”为最主要规范的福特模式广泛使用，使企业生产能力迅速超过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这种需求不足的本质是产业革命中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导致的“需求不足”危机。从微观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就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部分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形成了以差异化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结构范式，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差异化市场的形成导致了市场的巨大变迁，商学院模式也随之变化。一是市场不断变幻使得原先同质化的竞争性或者垄断性企业不再是市场的主体，带有差异化的寡头和垄断竞争性企业不断成长并取得成功，比较典型的就是斯隆领导的通用汽车在差异化竞争中逐步战胜福特王国，成为世界汽车的霸主。二是像老福特（H. Fort）那样集企业所有者、企业管理者甚至发明家于一身的“完人”不再出现，其职能开始分解，专业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的需求开始大量涌现。三是企业变大几乎没有止境，市场变化更加复杂，使得企业中的分工细致程度不断加大，层级不断增加，管理人员的理念需要高度统一，形成较为严格的企业管理范式，企业的理论需求开始加速提升。现代大学的“大”商学院模式随之产生。那么，今天“大”商学院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形成的规律又是什么？

### 斯隆管理学院就是这样炼成的

上文谈到现代大学的“大”商学院模式为哈佛商学院所创立，为什么要以斯隆管理学院为案例谈论“大”商学院模式？

MIT 的学校和学科特点突出，是一个以工科见长，以技术创新为己任的大学，就如同它的校徽上标明的“科学和艺术”是学校的生命线。斯隆管理学院在这样的学科



和学校背景下走出全新的道路。斯隆管理学院的历史是从 1914 年开始的，较其他著名大学建立商学院要晚一些。但是，1931 年在斯隆本人倡导和斯隆基金支持下开始建立以 Executive Development Programs（简称 EDP）为核心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开创了商学院教育新模式。从 1952 年创立“产业管理学院”到 1964 年斯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他们完成了从工科模式的管理学院到现代大学的“大”商学院的华丽转型，尽管现在他们还是叫“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斯隆商学院具备了“大”商学院的基本特征：以创新管理为基本立足点，通过学科方向在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会计学 and 统计学等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将经济社会，特别是企业实践提出的具体问题化为各个研究中心的课题，建立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将每个教师的课程与研究有机结合，形成精英式的人才培养、创新型的科研成果以及全方位的社会服务。要完成这些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1. 教师队伍无比强大。

斯隆管理学院官网提供简历的教师和研究人员（faculty）有 208 人，按照统计数据现有全职（full-time）教授 112 人，有终生职（Tenured）75 人，非终生职 37 人（Non-Tenured），女性 24 人。教师中有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十名美国科学和艺术院院士（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四名国家工程院院士（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两名国家科学院院士（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和技术奖（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获得者各一名。几乎每一个教师都出自美国前十名的大学，而且是在本领域的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现有三名华人教师，比较知名的是王江教授，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在拿到物理学博士后转到金融学。其他两位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带有很重的工科背景，博士分别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和哈佛。

专职教师和合作者以及访问学者共组成 23 个学科方向，应该相当于我们的系一级单位，既有比较传统的应用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和会计学等本专业，也有在国内比较小的专业，比如健康管理和组织研究等，其主要以教学为目标。同时，教师在 12 个中心中开展合作研究，有些也在建设或者考虑建设，例如金融工程实验室。但是，最有名的还是它的“领导力研究中心”（MIT Leadership Center）和“企业家研究中心”（MIT Entrepreneurship Center），它们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其基本特征就是在学科方向上努力钻研，在研究中心寻求合作的可能，在专业化教学中得到深化，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循环往复不断上升。